

王晓初◎著

Zhongguo Xiandai Wenxue Mingjia Mingzhu Xuanjiang

中国现代文学 名家名著选讲



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

王晓初◎著

Zhongguo Xiandai Wenxue Mingjia Mingzhu Xuanjiang

中国现代文学 名家名著选讲



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

内容简介

本书精选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经典名家,如鲁迅、郭沫若、郁达夫、徐志摩、周作人、茅盾、老舍、巴金、戴望舒、曹禺、艾青、赵树理、路翎、张爱玲、钱钟书等,通过对他们的介绍及其代表作品的解读,感受他们的思想追求、人文情怀、文学形式与语言艺术,在和他们的精神与艺术的对话中,使读者对中国现代文学思想与艺术的历史发展脉络有基本的了解,并提升读者的人文素质、思想情操、审美感受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现代文学名家名著选讲/王晓初著. — 芜湖: 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1.12

ISBN 978-7-81141-665-7

I. ①中… II. ①王… III. ①中国文学: 现代文学—文学评论 IV. ①I20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233636 号

中国现代文学名家名著选讲

王晓初 著

出 版 人: 张传开

责任编辑: 周晓毓 潘 安

装帧设计: 丁奕奕

出版发行: 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

芜湖市九华南路 189 号安徽师范大学花津校区 邮政编码: 241002

发 行 部: 0553-3883578 5910327 5910310 (传真) E-mail: asdcbsfxb@126.com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安徽芜湖新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版 次: 2011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规 格: 787×1092 1/16

印 张: 12.75

字 数: 208 千

书 号: ISBN 978-7-81141-665-7

定 价: 25.00 元

凡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版图书有缺漏页、残破等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目 录

绪论：人文精神与中国现代文学	(1)
一、人文精神、人文素质与人文学科	(1)
二、文学作为人文学科的特点与意义	(5)
三、中国现代文学与现代文化和语言	(8)
第一讲 鲁迅的小说、散文(诗)与杂文	(10)
一、鲁迅生平、思想与文学道路	(10)
二、《狂人日记》：中国新(现代)文学的总序言	(15)
三、《阿 Q 正传》：国民性的剖析	(21)
四、《故事新编》：鲁迅独特的文学创造	(28)
五、《野草》与《朝花夕拾》	(33)
六、作为匕首投枪的杂文	(42)
第二讲 郭沫若的诗歌	(51)
一、郭沫若的生平与文学道路	(51)
二、中国现代新诗的奠基：《女神》	(54)
第三讲 郁达夫的小说	(60)
一、郁达夫的生平与文学道路	(60)
二、《沉沦》解读	(67)
三、郁达夫“自叙传”小说的文体特征及其艺术成就	(69)
第四讲 徐志摩的诗歌	(73)
一、徐志摩的人生历程与文学道路	(73)
二、徐志摩诗歌的思想与艺术	(77)

三、《再别康桥》解读	(82)
第五讲 周作人的散文	(84)
一、周作人的人生历程与文学道路	(84)
二、“言志”小品(美文)的特征与意义	(88)
第六讲 茅盾的小说	(93)
一、茅盾的生平与文学道路	(93)
二、《子夜》等社会剖析小说	(97)
三、后期创作与《腐蚀》	(104)
第七讲 老舍的小说	(106)
一、老舍的生平与文学道路	(106)
二、《骆驼祥子》:底层市民的血泪悲剧及其文化反思	(113)
第八讲 巴金的小说	(117)
一、巴金的生平与前期文学道路	(117)
二、“激流三部曲”:《家》、《春》、《秋》	(120)
三、《寒夜》等后期小说	(124)
第九讲 沈从文的小说	(128)
一、沈从文的文学道路及其所构筑的“湘西世界”	(128)
二、理想人性的生命之歌:《边城》	(131)
三、重造民族品德的探索:《长河》	(134)
第十讲 戴望舒的诗歌	(136)
一、戴望舒的生平与诗歌道路	(136)
二、《雨巷》与《我的记忆》解读	(139)
第十一讲 曹禺的话剧	(144)
一、曹禺的生平与早期创作道路	(144)
二、《雷雨》:中国话剧艺术成熟的标志	(145)
三、《日出》与《原野》	(151)
四、《北京人》:人性的反思	(156)

第十二讲 赵树理的小说	(158)
一、赵树理的生平与文学道路	(158)
二、“新评书体小说”及其艺术成就	(161)
第十三讲 路翎的小说	(164)
一、路翎的人生历程与文学道路	(164)
二、青春的史诗:《财主底儿女们》	(168)
第十四讲 艾青的诗歌	(172)
一、艾青的生平与诗歌创作	(172)
二、艾青诗歌的意象系统及其忧郁	(173)
三、艾青诗歌的艺术特征与历史贡献	(175)
第十五讲 钱钟书的《围城》	(179)
一、钱钟书的生平与文学创作	(179)
二、《围城》:对人生与人类命运的沉思与探索	(180)
第十六讲 张爱玲的《传奇》	(186)
一、张爱玲的生平与文学道路	(186)
二、《传奇》:苍凉的人生启示	(187)
主要参考书目	(193)
后记	(195)

绪论：人文精神与中国现代文学

一、人文精神、人文素质与人文学科

“中国现代文学名家名作选讲”作为高等学校的一门公共选修课程属于人文素质课程。首先需要了解与回答的一个问题就是：高等学校为什么要开设和怎么学习这门课程呢？简单的回答就是：一个现代人的人生需要，或者说是一个现代大学生人格成长、文化修养与知识结构的需要。

“人文”一词，是外来词。从历史上看，它源于西方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Humanism：人性、人道、人文主义)。人文主义也称人道主义、人本主义，是针对欧洲中世纪的神道主义、神本主义提出来的。中世纪的欧洲，基督教统治着全部文化，神是宇宙的中心，排斥理性思维，认为人一生下来就是有罪的，只能通过禁欲修行，才能在死后的“来世”获得救赎(升天堂)。随着中世纪后期城市经济的发展，在地中海沿岸佛罗伦萨等城市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为了打破思想禁锢对生产力的约束，以人为本的人文主义思想应运而生。以人文主义思想为核心的欧洲文艺复兴，重视继承古代以人为本的优秀文化遗产，破除迷信蒙昧，崇尚理性和探索自然，是人类历史上的一次思想解放运动，为后来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扫清了道路。

以人文主义为旗帜的西方文艺复兴及启蒙运动直接导致了17、18世纪的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能够料想到有这样的生产力潜伏在社会劳动里呢？”^①这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共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28页。

产党宣言》中对那个时代社会、经济发展状况的描述。但是,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的进程同时也彻底改变了人类的生活方式。在现代社会中,快速发展的科学技术和大工业生产方式使人们追求感官刺激和物质欲望走过了头,低级趣味、急功近利、激烈竞争和冷酷无情随处可见。与此同时,在对物质与功利的盲目追逐中,人们的主体意识逐步丧失,想象力和创造力日益衰退,理想、信仰、伦理、道德,这些与人生的终极意义密切相关的基本社会规范与信念正在趋于瓦解。艾略特所刻画的《空心人》、马尔库塞所揭示的《单向度的人》都是这一现实的写照。

于是,在当代社会中,“人文精神”的旗帜再次被高高举起。20世纪后半期,在联合国倡导下,人文社会科学界基于对经济增长并不会“自然而然”地带来社会发展的价值判断,提出了“以人为本”或“以人中心”的社会发展理论,以纠正单一的以“经济增长”为目标的偏好和误区。1995年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召开的“人类有史以来的首次社会发展峰会”突出地强调:“单凭市场不可能消除贫困,也不可能获得公平和平等,而这二者却是发展的基石。”^①峰会更指出:“只有人——不论是作为个人还是作为社群——成为行动主体,变化和发展才能产生。”^②这说明上述社会发展理论在联合国的推动下已经得到世界各国的普遍认同。同样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总结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经验基础上提出的“科学发展观”的核心也仍然是“以人为本”。可见“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建构应该是人类在全球化时代的一个基本共识。

从一个企业来看,单一地追求物质功利效率,也是危险的。因为忽略了人文关怀,必然把人当作机器、当作物来操作和利用,必然引起工人的反抗,进而也影响企业的发展。如早期工业阶段工人捣毁机器的运动,就表达了这种反抗。所以现代企业普遍重视企业文化、企业精神的建构。

同样对于一个人的成长和发展来说,如果缺失了人文素质与人文情怀/精神关怀,也就必然成为一个不健全的人。鲁迅早在日本留学期间倡导中华民族的“新生”文艺运动的过程中,就在《科学史教篇》等论文中一方面肯定了

① 英奇(Inge):《导论:新千年中争取社会进步的步骤》,《国际社会科学杂志》第17卷2000年第4期。

② 克莱尔(Clare):《消除贫困与社会整合:英国的立场》,《国际社会科学杂志》第17卷2000年第4期。

科学技术在改造自然和推动社会进步方面的巨大作用:“西方物质文明之盛,直傲睨前此两千余年之业绩”,并且使“世界之情状顿更,人民之事业益利”^①。另一方面又明确地指出:“当防社会入于偏”,如果“使举世惟知识之崇,人生必大归于枯寂,如是既久,则美上之感情漓,明敏之思想失,所谓科学,亦同趣于无有矣。故人群所当希冀要求者,不惟奈端(牛顿)已也,亦希诗人如狄斯丕尔(莎士比亚);不惟波尔,亦希画师如洛斐罗(拉斐尔);既有康德,亦必有乐人如培得河芬(贝多芬);既有达尔文,亦必有文人如嘉来勒(卡莱尔)。凡此者,皆所以致人性于全,不使之偏倚,因以见今日之文明者也”^②。已经开始注意到实用科学(工具)理性对人性的扭曲,其结果不仅是造成人性的异化,科学也将被毁灭。因为在鲁迅看来,科学本质上是一种“人性之光”,并且“科学发见,常受超科学之力”,“本于圣觉”(灵感),“以知真理为惟一之仪的”^③。人类历史上,精神与物质的价值均有各自的适当位置并应相互平衡。——因而为“致人性于全”(人的全面发展),也应该修习与具备一定的人文素质与精神。人文素质是指人们在人文方面所具有的综合品质或达到的发展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它是由人文学科培育的。著名教育家蔡元培指出:“教育乃养成人格之事业也。使仅仅为灌注知识,练习技能之作用,而不贯之以理想,则是机械之教育,非所以施以人类也。”^④

《辞海》对人文科学作的解释:“人文科学源出于拉丁文 humanists,意即人性、教养。在欧洲 15、16 世纪时开始使用这一名词。原指同人类利益有关的学问,以别于中世纪教育中占统治地位的神学。狭义指拉丁文、希腊文、古典文学的研究。广义一般指对社会现象和文化艺术的研究,包括哲学、经济学、史学、法学、文艺学、伦理学、语言学等。”^⑤

所谓人文学科,是以人的内心世界、人的精神世界以及作为人的精神世界的客观表达形式的文化传统、各种关系辩证存在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它以人的生存价值、存在意义等为研究主题,关注的是人的精神及其意义的世界。

① 鲁迅:《文化偏至论》,《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9页。

② 鲁迅:《科学史教篇》,《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5页。

③ 鲁迅:《科学史教篇》,《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9-30页。

④ 蔡元培:《一九〇〇年以来教育之进步》,《蔡元培全集》第二卷,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407页。

⑤ 《辞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872页。

而这一领域是自然科学乃至社会科学(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法学等)均难以企及,并无能为力的。

所谓人文,就是人类文化,不过这里的文化主要是指人类的精神文化,是人类文化的核心部分,即“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以及包括作为社会成员的个人而获得的任何能力、习惯在内的一种综合体”^①。它是人类某个民族或社会所共有的“价值观和意义体系”,而一个民族和社会的共同的人文关怀与信仰就构成了这一民族与社会的精神价值,从而提供了“人之为人”的精神价值与意义家园。党的十七大提出建设“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的任务也就是要为现代中国建构一个提供现代人生信仰的社会主义的意义与价值的精神家园。

与人文科学不同,社会科学是一种以人类社会为研究对象的科学,通常包括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法学等。社会科学的形成远远迟于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从具体时间来看,其中的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等以经验的方法对社会进行实证研究的学科都是从18世纪中后期才开始独立出来,19世纪才逐渐建立起自己系统的理论结构。

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的关系是相当复杂的,它们之间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它们的区别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研究对象的不同。人文科学研究的是人的观念、精神、情感和价值,是“人”的精神世界及其所积淀下来的文化。人文科学的价值不在于提供物质财富或实用的技术,而在于为人类提供一个意义的世界,守护一个精神的家园,使人类的心灵有所安顿、有所依归。

如果说人文科学是研究人的主观世界和人类的精神文化的话,那么,社会科学关注的中心则是客观的人类社会,它是外在于具体个人的经济学、政治学、法律学、社会学等社会科学,从各自不同的角度与向度对人类社会进行研究,它们对经济、政治、法律、社会进行分门别类的或整体的考察,对人类社会的结构、功能、机制、变迁、动因等等进行深入研究,目的在于获得关于人类社会运行与发展的系统知识与理论,使人类能够更好地、更有效率地管理社会。

二是研究方法的不同。人文科学的研究方法主要是意义分析的方法,是

^① 泰勒:《原始文化》,上海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第1页。

一种解释的方法，而社会科学则较多的引进了自然科学的方法、实证的方法。所以社会科学可以称为实证科学，而人文科学则不能称为实证科学。

二、文学作为人文学科的特点与意义

文学是一种“人学”(高尔基语)，“文，心学也”(刘熙载语)。文学可以说是人生(全方位的，而不是某一侧面的，如法学)与人的心灵世界、精神世界(观念、精神、情感与价值等)通过语言方式的一种艺术建构与呈现。正因为它是人生全方位的一种艺术呈现，因而人们常说文学是社会生活的(艺术)反映，把文学称为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如毛泽东就说过《红楼梦》是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有许多人从不同的角度去研究它，甚至它涉及的食谱也被人写成了专著。恩格斯称赞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写出了贵族阶级的没落衰败和资产阶级的上升发展，提供了社会各个领域无比丰富的生动细节和形象化的历史材料，“甚至在经济的细节方面(如革命以后动产和不动产的重新分配)，我学到的东西也要比从当时所有职业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全部东西还要多”^①。而李泽厚则称鲁迅的文学作品是“当之无愧的中国近代社会的百科全书。只有两部散文文学堪称百看不厌，这就是《红楼梦》和鲁迅文集”^②。——也就是说，文学具有认识社会生活与人的价值与功能，相当于社会历史的认知功能。所以我们常常称赞在这一方面取得了突出成就的文学作品为“史诗”或“史诗性”。同时文学对于社会人生的艺术呈现又是以人，特别是人的精神与灵魂为核心的，因而文学史又常常被称为人的心灵史、灵魂史(勃兰兑斯语)。

不过同样是人文学科的文学又不等同于历史。亚里士多德说，历史描写已经发生的事实，而文学则描写可能发生的事情^③。“可能”也就是虚构(但这不是任意虚构，而是在社会人生“可能”的基础上的虚构)构成了文学不同于历史的一个鲜明的特征。同时这种虚构还有另外一个特征，就是这种“虚

^① 恩格斯：《恩格斯致玛·哈克奈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62页。

^② 李泽厚：《略论鲁迅思想的发展》，《近代中国思想史论》，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39页。

^③ 参见亚里士多德《诗学》第九章，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

构”不仅仅根基于社会历史的基础,而且还体现了作家对于社会人生的认识、理解、见解与情感。例如前面引述李泽厚说《红楼梦》和鲁迅文集是两部堪称百看不厌的伟大作品之后,接着说“它们的性质却迥然不同。《红楼梦》是封建社会的没落挽歌,鲁迅的散文则是指向它的战斗号角”^①——这种截然不同的性质主要就是作家在创造/虚构这些文学作品时融注于作品之中的认识、见解、情感等因素的差异造成的。曹雪芹虽然在《红楼梦》中表现了封建社会必然崩溃没落的必然趋势——所谓“忽喇喇似大厦倾,昏惨惨似灯将尽”。“为官的,家业凋零;富贵的,金银散尽;有恩的,死里逃生;无情的,分明报应;欠命的,命已还;欠泪的,泪已尽。”“好一似食尽鸟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但是毕竟带有自传性,因而对于这一结局不无惋惜。而鲁迅则是反封建的启蒙先驱,揭露封建礼教“吃人”的思想贯注在他的全部文学作品之中。正是这样一种思想与情感可以感染人,影响人,引导人对于人生的认识与选择,并进而影响到社会生活与历史的进程。比如在现代历史上许多革命者都是接受新文学作品的感染而走上革命的道路的^②。而五四以来蔚为时代大潮的“走出家庭”的洪流,则明显地受到易卜生的戏剧《娜娜》和巴金的小说《家》的启示与感染。——这一功能可以称为文学的教育功能,或者社会(意识形态)功能。这也是文学曾经产生过巨大的社会影响和作用的原因。但是这一功能必须以艺术的方式实现。一是必须是艺术,即具有艺术的形象与形式。二是必须是一种审美的接受方式,即在审美的愉悦中达到一种潜移默化的熏陶与改变(这也正是鲁迅弃医从文,从事“改造国民性”的启蒙事业的文学前提),即所谓的“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杜甫语)。如果把文学变成标语口号(如革命文学时期的郭沫若),或者赤裸裸地进行政治道德的说教,就越出了文学的边界,而变成了单纯的宣传。所以鲁迅明确指出:“我以为一切文艺固是宣传,而一切宣传却并非全是文艺,这正如一切花皆有色(我将白也算作色),而凡颜色未必都是花一样。革命之所以于口号,标语,布告,电报,教科书……之外,要用文艺者,就因为它是文艺。”^③

① 李泽厚:《略论鲁迅思想的发展》,《近代中国思想史论》,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39页。

② 如陶铸、胡耀邦等老一辈革命家都谈到他们走上革命道路都受到过蒋光赤的小说《少年漂泊者》的影响。

③ 鲁迅:《三闲集·文艺与革命》,《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85页。

文学另一个鲜明的特征是文学的语言艺术性或者审美性，也即前面提到“史诗性”中的“诗”性。这首先表现为生动的艺术形象性。也就是说文学所虚构的艺术世界是以栩栩如生的感性的艺术形象的形式呈现出来的，而且这一形象还饱含着丰富的人生情感、想象，以及智慧，因而能够感动读者，使读者产生情感与精神的共鸣，获得审美的享受。恩格斯说：“民间故事书的使命是使一个农民作完艰苦的日间劳动，在晚上拖着疲倦的身子回来的时候，得到快乐，振奋和慰藉，使他忘却自己的劳累，把他的硗瘠的田地变成馥郁的花园。民间故事书的使命是使一个手工业者的作坊和一个疲惫不堪的学徒的寒伧的楼顶小屋变成一个诗的世界和黄金的宫殿，而把他的矫健的情人形容成美丽的公主。”^①——这样一种“快乐，振奋和慰藉”，就是文学的审美作用。它可以在虚构的艺术世界中，（通过想象）使人的本质力量得到充分的实现，从而使被现实（权力、金钱、功利）所扭曲的心灵得到解放与复活。或许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蔡元培主张以“美育代替宗教”，也就是在审美过程中实现人的心灵自由与人性的复苏，从而提供一种人文关怀与精神家园。这一功能在较低层次则是娱乐作用，特别是那些满足世俗大众欲望冲动的通俗文学（性、暴力、恐怖、幻想等）。所以科学家钱学森曾把金庸的武侠小说称为人的精神体操。

值得注意的是文学不同于其他艺术种类（如音乐、绘画、雕塑等）的是它的艺术形象与形式是通过语言来塑造的。而语言是人不可须臾离开的工具。因而文学语言在日常语言的基础上又具有不同于日常生活语言的特征。如果说日常语言是单义的，那文学语言就是复义与多义的；日常语言是清楚明白的，文学语言就是含混朦胧的；日常语言是通顺逻辑的，文学语言则是反常甚至反逻辑（悖论）的。当然文学语言又是建立在日常语言基础之上的，也就是说它包容了日常语言的内涵（否则人们根本无法理解），但又超越这些内涵的边界，多出了一些内涵与意味。而文学性往往存在于超出日常语言的那一点意味中。这在诗歌中最为突出。比如鲁迅《野草》中“于天上看见深渊，于一切眼中看见无所有”（《墓碣文》），“彷徨于无地”（《影的告别》），“无物之阵”（《这样的战士》），还有作品标题本身，如《死火》、《为了忘记的纪念》等，都充满了丰富的情感、认知与意味的悖论性张力。这种悖论性常常是文学性、诗

^① 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66年版，第401页。

性之所在。

三、中国现代文学与现代文化和语言

“中国现代文学”是中国现代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现代汉语的典范载体,同时也构建着现代人文精神的家园。“中国现代文学名家名著选讲”——“中国现代”概括了本课程内容的(时空)范围“中国现代文学”(1917—1949)^①——奠定了我们现代文化与语言的原型。从1917年至1949年,虽然只有短短的32年^②,但是却是极其丰富的30余年,从纵向时序来看,从五四文学革命的20年代的新文学,再到30年代的革命文学(左翼文学),再到40年代的抗战文学(延安文学),既是一种文学的延伸与传承,又是一种文学的中断与开始,因而每个时段都呈现出了不同的特征。从横向坐标来看,在思想/艺术倾向方面,有启蒙、左翼、自由、唯美、现代、通俗等的不同,从文学样式来看,有小说、诗歌、戏剧文学、散文(杂文)等的区别。“名家名著”,则是指在这一文学时空场域中不同时期、不同思潮、不同文类、不同样式的经典作家与作品。所谓经典是指具有典范性、权威性的,经久不衰的传世之作;经过历史淘汰选择出来的“最有价值的(认识、教育、审美等)”的作品,也可以说是现代文化与语言“原型”的具体体现。当然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主体认知的变化,这种经典的标准也在发生着不断的变迁。比如20世纪末的“20世纪作家排座次”就颠覆了主流文学的认知秩序^③。实际上从中国现代文学

① 这一“现代”(时间)概念当然存在争议,比如笔者出版于2002年的《中国现代文学发展演变史1898—1989》,划出了1898年至1989年的时间场域,但仍然是探索性的。出于教学考虑,暂沿用传统主流的概念。

② 因而一般都称“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钱理群等编写的文学史就叫《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③ 1994年,王一川主编的《20世纪中国文学大师文库》(分小说、诗歌、散文、戏剧4卷)由海南出版社出版。其小说卷将鲁迅、沈从文、巴金等9位小说家的作品收入,原来作为经典的茅盾等被排除在外,原来被排斥为通俗作家的金庸列第4位,由此引起强烈反响。1995年,钱理群、吴晓东在《“分离”与“回归”——绘图本〈中国文学史〉(20世纪)的写作构想》(载《文艺理论研究》1995年1期)一文中写道:“在鲁迅之下,我们给下列六位作家以更高的评价与更为重要的文学史地位,即老舍、沈从文、曹禺、张爱玲、冯至、穆旦。”——同样颠覆了传统的文学秩序。

诞生以来,对它的认知、阐释与评价就始终处于“重写”^①中。——但是无论怎样“重写”,中国现代文学作为中国现代人文精神的语言艺术的表达,其现代人文精神多向度的内涵与语言表达的艺术形式是无论怎样也不能否弃的标准。正是他们的作品传达了中国现代人文精神的不同表达,同时也探索了中国现代汉语表达的各种可能性。正是依据这两条标准^②,我们透过中国现代文学史无数次的“重写”粗略选择了鲁迅、郭沫若、郁达夫、徐志摩、周作人、茅盾、老舍、巴金、沈从文、曹禺、戴望舒、艾青、赵树理、路翎、钱钟书、张爱玲等经典名家,通过对他们的介绍及其代表作品(如《狂人日记》《阿Q正传》《故事新编》《野草》《朝花夕拾》《华盖集》《女神》《沉沦》《再别康桥》《苦雨》《子夜》《腐蚀》《骆驼祥子》《家》《寒夜》《边城》《雷雨》《日出》《原野》《北京人》《雨巷》《我的记忆》《小二黑结婚》《大堰河》《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财主底儿女们》《围城》《传奇》等)的解读,感受他们不同的思想追求、人文情怀、人生思考、文学形式与语言艺术,从而提升大学生的人文素质、文化修养、审美感受能力与语言表达的能力。

① 1988年《上海文论》开辟由陈思和、王晓明主持的“重写文学史”专栏,开始了“重写文学史”思潮。其实从早于他们的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到后来的“再解读”,乃至“重返80年代”等都是重写的一种表现。

② 同时兼顾了“五四”、30年代、40年代等不同历史时期,小说、诗歌、戏剧文学、散文(杂文)等不同体裁,启蒙、左翼、自由、唯美、现代、通俗等不同倾向等。

第一讲 鲁迅的小说、 散文(诗)与杂文

鲁迅与中国现代文学是紧密联系的。在某种意义上说,鲁迅是中国现代文学之父。虽然一般以1917年《新青年》发表的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作为五四文学革命的标志,但是作为五四新文学的开山标志却是鲁迅1918年5月发表的《狂人日记》。也就是说中国现代文学自《狂人日记》起才开始成立。鲁迅倡导的“国民性”改造的启蒙主义思想构成了中国现代文学最基本的母题。除短篇小说外,散文诗、杂文和“故事新编”体小说都是鲁迅独特的创造。他的文学是迄今为止得到公认的最耐读、最现代也最具民族性的中国现代文学。

一、鲁迅生平、思想与文学道路

鲁迅(1881—1936),浙江绍兴人。原名周樟寿、后更名为周树人,字豫才,鲁迅是他发表《狂人日记》开始使用的笔名。从小在越文化的熏陶下,养成了追求自由,反抗压迫的个性^①,在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的人生旅途中广

^① 在一个个夏夜,当他躺在大桂树下的小板桌上乘凉,祖母摇着芭蕉扇坐在桌旁,由西湖的雷峰塔而给他讲起白蛇娘娘带着青蛇丫环嫁给曾经救过她们的许仙,却被法海和尚生生拆散,并把前来寻夫的白蛇娘娘镇压在雷峰塔下后,他当时“惟一的希望,就在这雷峰塔的倒掉”(见鲁迅《论雷峰塔的倒掉》,《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79页)。稍大一点在大舅父那儿看到一部弹词《白蛇传》,竟用指甲将法海绣像的眼睛掐得稀烂(参见周作人:《关于鲁迅》,新疆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402页)。对《山海经》中“人面的兽;九头的蛇;一脚的牛;袋子似的帝江;没有头而‘以乳为目,以脐为口’,还要‘执干戚而舞’的刑天”则充满了如醉如痴的神往(见鲁迅《阿长与〈山海经〉》,《鲁迅全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55页)。

泛吸收了(越)民族文化与越地民间文化的营养。少年时代适逢家道式微^①,他在“从小康人家坠入困顿”的途中,深深地领略了世态的炎凉,感受了封建家族制度的腐败与堕落——“我有四年多,曾经常常,——几乎是每天,出入于质铺和药店里,年纪可是忘却了,总之是药店的柜台正和我一样高,质铺的是比我高一倍,我从一倍高的柜台外送上衣服或首饰去,在侮蔑里接了钱,再到一样高的柜台上给我久病的父亲去买药。”^②同时常随母亲回外婆家探亲的经历也使他熟悉了农村,与农民保持着亲密的精神联系,构成了他后来思想与文学及其走向左翼的精神原点。1898年他“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③——考入南京水师学堂,次年转入江南水师学堂附属的矿务铁路学堂读书,深受维新思潮书刊《时务报》、《译书汇编》,特别是严复译的《天演论》所宣扬的进化论的影响,开始思考祖国和民族的命运。

1902年赴日留学,以“我以我血荐轩辕”(《自题小像》)的诗句表达了献身民族解放事业的志向。在日本预备学校毕业后,“从译出的历史上,又知道了日本维新是大半发端于西方医学的事实”^④,便进了仙台医学专门学校。一次在教室里放映记录日俄战争的幻灯片,其中出现了一个中国人被日本兵捉住作为俄国间谍而杀头的镜头,围观的中国人面对惨剧却无动于衷,这使鲁迅深受刺激,觉悟到对于愚弱的国民,第一重要的还是改变他们的精神,因而弃医从文。1906年鲁迅来到东京拟与周作人、许寿裳等创办《新生》杂志未果。1908年发表了《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等重要论文,在《文化偏至论》中他既批判了洋务派的“金铁论”,也批判了改良派的“立宪国会”主张,提出了“掇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以“立人”的启蒙主义思想——“是故将生存两间,角逐列国是务,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⑤“人各有己,而群之大觉近矣”^⑥,“国人之自觉至,个

① 1893年,鲁迅13岁时,祖父周介孚(翰林)因“科场案”被判“斩监候”。

② 鲁迅:《呐喊·自序》,《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37页。

③ 鲁迅:《呐喊·自序》,《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37页。

④ 鲁迅:《呐喊·自序》,《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38页。鲁迅还说:“我的梦很美满,预备卒业回来,救治象我父亲似的被误的病人的疾苦,战争时候便去当军医,一面又促进了国人对于维新的信仰。”(同前)

⑤ 鲁迅:《文化偏至论》,《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8页。

⑥ 鲁迅:《破恶声论》,《鲁迅全集》第8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6页。